

敦煌学导论

〔日本〕藤枝晃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系印

说

明

本稿为国际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今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二十三在我系为本科学生讲课的记录稿。现应本系师生和前来听课的兄弟院校同志们的要求，整理印供参考。

藤枝晃先生原来的讲课提纲，是按十三次授课时间分为十三个标题的，其中（一）、（二）为序说；（三）——（五）为敦煌历史；（六）——（八）为西域敦煌美术；（九）——（十三）为敦煌遗书。在整理此稿时，为了适应我们的习惯，征得藤枝晃先生的同意，改为四大标题，即：（一）序说；（二）敦煌历史；（三）西域敦煌美术；（四）敦煌遗书，下设小标题未动。

我们整理此稿时，力求忠实地表达出藤枝先生的讲授内容，仅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在讲授过程中，藤枝先生给大家的一些主要参考材料，也作为附录编入了本稿。

武汉大学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学张荣芳同志在听课过程中也参与了本稿的部分整理工作，在此特表谢意。

南开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录

一、序说

(1)材料

(2)地方王国

二、敦煌历史

(1)敦煌之开设(汉代烽燧木简)

(2)高昌国与东阳王

(3)吐蕃、归义军时期

三、西域敦煌美术

(1)西域佛洞、敦煌初期佛洞

(2)敦煌后期佛洞

(3)絹画

四、敦煌遗书

(1)遗书之所在与现状

(2)遗书之大概

(3)藏经洞之原形

(4)写本书志学

(5)古文书学

敦 煌 学 导 论

(日本) 藤枝晃教授

这次讲学的题目叫敦煌学导论，也就是敦煌学的入门。我准备第一、二次讲序论，三、四、五次讲敦煌的历史，六、七、八次讲西域敦煌美术，以后就是敦煌吐鲁番遗书，再慢慢地深入下去。但这并不是全部敦煌学，因为它没有包括敦煌佛教。我知道现在年轻的中国人不喜欢佛教，所以我不讲佛学，只是在讲历史、美术和遗书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这些内容可以做为敦煌学的一般性论述。

一、序说

1、材料。在这个题目中我要讲的主要是西域敦煌遗书的来由和所在现状。

西域敦煌学的材料不同于研究中国历史时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对于敦煌西域的情况写得很少，或不写。西域学材料就是文物本身和遗书。但遗书不在中国，大部分都散在欧洲和日本等外国。这些遗书被携往外国是二十世纪初，从1900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十几年之中的事情。以后由于发生过两次大战和一些革命，再加上各国博物馆和机构也有一些变动，这些遗书的经历也都比较复杂。

从中国取走敦煌遗书的第一个人是瑞典的斯文赫定 (Sven Hedin)。190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亚细亚，以后又来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在1930年左右，领导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这个考察团先是由德国的航空公司供给经费，后来国民党的交通部打算铺设

一条铁道到乌鲁木齐，委派赫定进行调查，这个考察团便由交通部供给经费。再以后又改为由瑞典科学院和中国的教育部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所获文物一半在瑞典，一半留在中国。留在中国的东西被运到南京，二次大战时又被送到美国，以后由美国又转到台湾。现在有一些在台湾，但大部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Stockholm）。那里有一个民族学博物馆，地址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原来是座兵营，二、三年前才盖起一座新房子，去年十一月开馆。老房子后面有一个独立的小房子，是赫定自己用的，现在新房子的一部分仍保留原来的样子。文物与遗书在那里保存得很好，但过去很少人研究过这些东西。瑞典科学院从二十年前开始陆续出版赫定携来的文物，现在已出版了四十多本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报告，有英文版、德文版，大部分是英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前四本，主要是论述的考察团的历史概况。其余是分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考古学等几十个部分出版的。现在可能已出版了五十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是赫定一生中最后的事业。这以前赫定最主要的著作是《南部西藏》，是一部五、六册的大部头。此外他自己还写有传记《我的探险生涯》，该书出版很早，因此没有包括1930年以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历史。有汉译本是《西北考察团丛刊》之一。日本曾两次出版的《赫定全集》（白水社），收集了已发表的赫定的游记。赫定的文章写得很好，描写很生动，通俗有趣。被译成几十国文字，英文、德文都有，不知有没有中译本？1979年在瑞典出版了一本赫定的传记。

第二个人是斯坦因。他本是匈牙利人，曾在德国和英国上大学。后来在印度政府工作，担任一个学校的教师。1900年他第一次到中亚细亚和中国的新疆。他写的报告叫《古代和阗》。1900年除

斯坦因外，许多西洋人来到新疆。那时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英国人自己来怕引起问题，而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在印度政府工作，便由印度政府派到新疆来。（赫定是瑞典人，而瑞典是中立小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此国没有参加两次大战——，赫定曾在德国读过大学）。斯坦因后来入了英国国籍，成了英国的爵士。他的《古代和阗》一书，1943、44年左右曾在北京出版影印本。斯坦因1907、08年第二次旅行时，调查了楼兰遗址，并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那以后到1913、14年又第三次来到新疆。第二次的报告《Serindia》共五大本，1921年出版。去年在英国影印再版了，现在可以买到。第三次旅行报告题为《Innermost Asia》，（《亚洲腹部考古记》）共四大本。

1921年，出版了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绢画。这些绢画共有几十张，是他同抄本一块买来的。三年以前在日本京都再次出版并附了日文的说明。斯坦因在六十年前也曾写过说明，但六十年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例如，一个美国人发现一件麻布画是一半在印度，一半在伦敦。许多人特别是日本人认为斯坦因是英国人，所以他携走的东西一定收藏在伦敦，而他的报告也都是在伦敦出版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所携去的大部分文物是藏在印度的新德里。新德里把这些文物都陈列在新建的中央亚西亚陈列馆。1946年印度独立后曾在英国举办了一个印度美术展览会，从印度各大博物馆中选出了最好的东西送到英国。展览会结束后，英国把东西归还印度，印度政府在新德里旧中央亚细亚陈列馆之旁边^新建立国立博物馆，把中央亚细亚陈列馆改为该馆的中央亚细亚部。另外也有一些东西被收藏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到中央亚细亚时，除印度政府之外，这个大英博物馆也给了他一些经费，因此他取回的东西

应该按比例分配。印度政府给钱多，大英博物馆给钱少，所以东西在印度的多，在伦敦的少。斯坦因探险回来后，在北印度的山中写报告，一种是科学报告，一种是中途的旅行见闻，如《Sand-lnried ruins of khotar【沙埋和阆废墟】》到了二十年代，他希望再次去新疆，但是已经不可能了。斯坦因写了《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中译作斯坦因西域考察记）一书，主要内容是关于他第一次到第四次探险的经过。1936年出版了汉译本。以后他继续在伊朗小亚细亚方面进行考古工作。四十年代死在阿富汗喀布尔，喀布尔有他的坟墓。两三年以前美国出版了一本斯坦因传，作者是一个美国女人。

第三是德国。德国皇帝曾四次派探险队到中亚来。第一次是格伦威德尔领导。他本来是个画家，他的探险内容主要是进行佛教美术研究。第二次是勒柯克领导，他的祖父是法国人，因此他起了个法国名字。于1906年、1907年进行的。其间勒柯克得病，格伦威德尔来到新疆，代替勒柯克领导探险工作，以后作为第三次，1913-14年进行的第四次探险又是勒柯克领导的，他们带回来的东西都藏在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大批壁画被嵌挂在墙壁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博物馆被炸，壁画也全部被毁掉。美国人占领西柏林后缴获了博物馆的藏品。两三年后美国人走了，一些被藏在其他地方的藏品又出现了。一度藏在西柏林郊外的Dahlem村国立博物馆。1970年新建《印度美术馆》于其旁，今藏于此馆。抄本现在藏在东柏林学士院古代史考古学中央研究所，他们出版了一本《高昌》，还有《佛教的古代后期美术》共六本。西洋的古代就是希腊罗马，这里说的意思是希腊美术西传，和基督教一起，出现了最初的基督教美术，即后期希腊美术（或古代美术），古代美术东传，

和佛教碰到一起，出现了后期古代佛教美术。这套书共有六册，它是两三年以前在奥国再版的。现在大批壁画都已毁坏无存，剩下来的只有此图册而已。除了这些学术报告外，勒柯克又写了两本游记，其中一本是《追及希腊痕迹》(Auf Helles Spuren)，我将它翻译成日文。可是1945年印刷厂被炸，此书没有了。第二本是《东土耳其斯坦之土地与住民》亦有趣味。

第四是法国伯希和，他来过一次。他带走的东西最初是分别放在三个博物馆中，后来法国博物馆改组，有关亚细亚方面的东西都放在基美博物馆。1976年在博物馆新建的中庭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伯希和重要的东西都选在这个展览会展出的目录里。1979年是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又开了一个中央亚细亚遗物的讨论会，同时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会，在伯希和工作过的那间屋子中，放上了一部分目录。

伯希和的报告中重要的是《敦煌的洞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共六册，大概是在1926年出版。这是关于敦煌的第一个材料。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以前，除这部书与斯坦因拍照的照片以外没有其他材料。伯希和探险时带去了一位照像专家。对于带回去的文物，集合了许多人进行研究，现已出版。书名叫做《考古资料》。第一册是《Toumehouk》，然后分为绢画、织物、雕刻等部分，现已出版了六七册。共二十来本，尚未出完。目前法国的专家正在继续研究中。

第五是俄国。俄国人鄂登堡(Oldenburg)是佛教学的专家。他曾两次到新疆。1937年出版了他五十岁的颂寿文集。该书中有他的传记，其中记述了第一次旅行的情况。1913、1914年第二次旅行时，他到了敦煌，但传记中对此没有什么记载，所以外国人

都不知道。鄂登堡回到俄国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他带回来的东西没有打包就送到亚细亚博物馆。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64年，那时还有他的行李。现在考古文物送到列宁格勒的埃尔蒙塔什博物馆（冬宫）亚细亚部保存，有两三个专家在进行研究。鄂登堡从敦煌搜集了许多写本，但一直为外国人所不知。直到1962年在莫斯科举行国际东方学会时才第一次发表，使外国人非常惊讶。

最后是日本。首先是大谷光瑞，他是京都西本愿寺的长老，热衷于研究日本佛教的源流。他三十岁左右时，从英国到西巴基斯坦经葱岭到喀什尔哈。他的随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其内两人通过吐鲁番、蒙古回到日本。其后，桔瑞超也从英国来到新疆。他在新疆时失去了和日本的联系。他的朋友吉川小一郎便到新疆找他。两人在敦煌相遇。后来桔回到日本，吉川又继续西行，一年后也回到日本。西本愿寺是日本佛教中最大的一派。西洋的探险队都是国家派的，可是日本的探险是和尚自己筹措经费，因此桔瑞超带回来的东西藏在神户自己的住宅中。为了探险，大谷非法地动用了西本愿寺的经费，因此被免去门主之职，逃避到上海。其后他对西域就不关心了。两三年以后，在上海又存放一些东西，卖给旅顺博物馆。那些东西现在还在贵国的旅大博物馆。还有一些留在神户和京都。后来留在神户的东西都给了当时的朝鲜汉城总督府博物馆，即现在的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朝鲜战争时曾运到南方庆州收藏二十年，现已运回汉城。韩国没有研究中亚细亚的专家，但他们又不希望日本帮助。在京都的部分，现在东京的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中保存。西本愿寺有一个龙谷大学，存在京都的那一部分文物，现在龙谷大学。总之，桔瑞超等人携回的文物现在分别保存在旅大博物馆、东京博物馆、汉城博物馆、龙谷大学等四处。另有一些东西已不知下

落。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的论文（见《龙谷》杂志）。

《西域考古图谱》一书是1917年出版的，五六年前在日本再版。《新西域记》是1937年出版的，此书收集了探险队员的日记和刊行物。二十多年以前在龙谷大学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出版了六本《西域文化研究》，此书进展很快，因此其中虽有不少好文章，也有不少质量较差的文章。

以上所讲是主要的西域文物。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如丹麦有两三幅壁画小片，美国纽约博物馆及日本私人手下也有一些东西，但数量都很少。

顺便提及，勒柯克的《新疆文化的宝库》一书有汉译，是从德文转译成英文，再转译为汉文的。

上面我讲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瑞典，但没谈美国的收藏。许多文书里说美国人华尔纳从敦煌带走了一部分壁画，并称他为文化盗贼。华尔纳在三十年代确曾来过敦煌，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Fogg博物馆看到他取走的两幅壁画时，感到很失望，那是两个很小的壁画与两个塑象。因此我在上面讲课时没有专门提到美国人。俄国人拿走的东西比这要多得多，中国人为什么不叫俄国人文化盗贼呢？

2、地方王国，或称边境王国

研究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材料是二十四史，政书，还有其他的杂记随笔。可是关于敦煌历史，一般的史书中都写得很少。这是因为正史主要是根据官方的观点来写的，因此对于官方认为并不十分重要的一些边疆地区的情况，就不写了。

敦煌距长安约一千五百公里，汉代才开辟了敦煌这个城镇。当时为了维持这个城镇和通往西域的道路，需要很多的军队，所花费

的代价大大超过了从这里所能得到的利益，因此汉武帝向西方扩张势力的政策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这种争论在《盐铁论》中得到充分反映。当时是否真的有这场争论已不能得知，但此书的作者通过讨论的形式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写了出来。我认为这样有趣味的书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仅有的。前年我的一个法国学生把此书翻译成了法文，受到了法国人的欢迎，发行量很大。

如前所述，为了维持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需要很多费用，因此每当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削弱时，就无法维持了。汉末就是这样，后汉时所谓三绝三通就是指的和西域的关系时断时通的情况。即后汉初年和西域相通，后来力量削弱就断绝了，再后来又勉强通，但最终结果还是维持不住。这种时断时通是从中央政府方面来看的，实际上也就是说，住在这里的人有时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有时又和中央政府断绝关系。而正史主要是写中央政府管辖地区之内的事，对于这些放弃的地区也就不提了。汉代时，西域有不少地方居民已达万余人，军队也有数万名。在与中央政府断绝时，他们仍然驻在那里，因此形成了一些汉人的城镇和居民点。这些汉人以后世代定居下来，并且非常珍惜地保存着中国的衣冠，每年到祭祀时把衣冠拿出来穿上。关于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和宋以后才有记载。总之从敦煌开辟以来的两千年间敦煌与中央断绝的时间比它受中央管辖的时间要长。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本身也时时产生脱离中央政府而自行独立的要求，其最初之例是汉末中国内地发生战乱时，窦融看到河西地方有发达的农业和足够的武装势力，以这里为根据地进行中间贸易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便集合同族人在这里实行了独立。总之，两千年中，每当内地发生战乱时，在这个地区就会出现象窦融这样实行独立的情况。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是两三次。上面我讲的

是中央政府放弃河西地方和河西地方想脱离中央而独立的两种倾向。还有更复杂一些的情况，就是异民族和此地的汉人一起组成一个共同的政治单位，其皇帝有时是外族，有时是汉人。实际政治权力是外族人掌握，而实际行政事务则由当地的汉人处理，异族人统治汉人是很难的，因为汉人的行政能力很强，他们只好用当地的汉人来统治汉人。

五胡十六国中有五个凉国，日本的松田寿男把这五凉称为《河西王国》，意即河西地方的国家。五凉的皇帝都不是汉人，有的是匈奴人，有的是氐人或鲜卑人，但它的政治组织完全采取汉人的形式；居民是汉人，也有许多本地地区的少数民族。五胡十六国时，中国内地十分混乱，但河西地方却比较平稳。这里继续同西域进行着贸易，佛教也在这时传来，当时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在到长安以前也曾在河西地方滞留了好几年。千佛洞也于这时开始建立。当时除河西之外，还有燕、赵、鲜卑的慕容氏等。日本的田村实造，研究东北的历史，写过许多《慕容王国》的著作。河西王国和慕容王国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河西王国的外部是突厥、西域等西方民族，慕容王国的外部则是契丹、鲜卑。当时中国的西北方面有前凉后凉，东北方面有前燕后燕，一个国家灭亡了，马上又在这里建立另一个同样的国家，关于陕北南匈奴方面的问题，内田吟风研究过。因此我把这些国家统称为中国的边境王国。这一类型的国家在汉末和三国时代由汉人和匈奴人联合就成立了。我们在两年专门讨论过这些问题，大家认为叫做边境王国比较合适。讨论的内容曾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上发表。由于《历史教育》的编辑部没有理解这次会的目的，对于这个词，我本身也没有坚持，因此在史学界尚未成为通用的词。

这些国家再扩大之，少数民族的皇帝成为全中国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北魏、辽、金、元、清五个王朝。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Karl Wittfogel（英文名）Vogel（德国名字）把这些王朝叫做Dynasties of Conquest即征服王朝。这个

“征服王朝”现在在日本已成为学术上通用名词，高中课本已完全采用了。中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语？我认为应该有个适合的称呼，因为这几个王朝和一般的汉族王朝有很多不同。辽代有北面官、南面官。南面官是中国式的政治组织，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唐代的六部。北面官则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契丹人的游牧组织。元朝的政府长官都必须是蒙古人，其下是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就是金朝的人，南人是宋人，色目人是西域人。那时蒙古人口不多，但最有势力。元朝中国的皇帝同时又是蒙古可汗，一个人有两种官位，元朝的文化是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总之这五个王朝和其他的王朝是有些不同的特点。对于这五个征服王朝，在历史中都有记载：《魏书》、《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关于五胡十六国，在《晋书》载记中和一些外国列传如西域传、北狄传、南夷传中也有记载。刚才谈到的三个边境王国都是没有征服王朝那么大的小王国，历史中没有记载，外国也没有记载。边境王国不仅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有，早在战国时代的燕、赵也属于这个类型，国王是汉人，可是居民有许多少数民族。燕和赵有贸易往来，政治上文化上也有联系。例如赵国国王“胡服骑射”，北方少数民族作战时骑马，赵国的军队也骑马。燕、赵的国家和内地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也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来金朝和宋朝之间有个齐国，存在了十几年，当时女真人统治汉人非常困难，便把刘豫弄出来做了皇帝。对宋朝来说，和女真对峙时，如

果中间有齐这个缓冲地就比较方便。这也可说是一种边境王国。时代较近的例子如满洲国和张家口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蒙古政府管辖地区的县长是中国人，副县长是日本人，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县长手中。蒙古政府下设宣化省、大同省两个省和三四个盟，连日本也没有承认这个蒙古自治政府。我住在张家口时，写文件时都是写“中华民国察哈尔省张家口市”。那里用蒙疆银行的钞票，和中国不同，和满洲国也不同，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单位。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这样的国家。刚才已经说过，敦煌的历史在中央政府统治下和脱离中央政府的时间相比，是脱离的时间较长。九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二百年中，敦煌地方叫做归义军节度使。最初曾控制河西地区，和前凉后凉所管辖的地区一样大，后来又形成了沙州和瓜州两个绿洲小王国，名义上不叫独立国，是中国的地方官，即归义军节度使。在《五代史》、《宋史》中却列入外国传。瓜州沙州都包括在其中。甘州被列入回鹘，吐蕃六谷部在凉州割据，只有沙瓜两州地方是汉人居住的，象孤岛一样。汉人还保持着汉文化。五、六世纪到七世纪，在今日的吐鲁蕃也曾出现过脱离中央象孤岛一样的汉人小国家高昌，保存了汉族文化。但这些小国家和外族的联系十分频繁。如沙州王的夫人是回鹘人，他的女儿是于阗王的夫人。高昌王最早是北朝时封的，另外他还有突厥的王位。高昌的居民有汉人和少数民族，政府的记录是用汉文写的。

最后再重复一下，研究敦煌、西域、高昌等地的历史用普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是不行的，研究敦煌，就主要是用敦煌的材料，即敦煌的文物和遗书，如何用这些比较麻烦的材料来进行历史研究目前尚未研究出好方法来，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解决。

二、敦煌历史

(1) 敦煌之开设(汉代烽燧、木简)

关于开设敦煌的问题,《史记》和《汉书》中记载比较混乱。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释,但解释各不相同。《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设了酒泉、张掖郡,公元前111年,又分此二郡而开设了武威、敦煌郡,合称河西四郡。但是在《史记·大宛传》中还有一个河西郡,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武威原来的名字叫河西郡,后改为武威郡。这种看法是在二三十年前提出来的,去年年底出版的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中也采用了这种意见,认为武威郡就是河西郡。经由河西四郡可以通往西域。过去这里是匈奴人居住的地区,匈奴被赶走后,汉武帝把罪人与贫民徙到这里,打算直接对西域贸易,这样便出现了敦煌。1906年斯坦因在这里发现了汉代长城遗迹和700枚木简,1913年又发现了三百枚左右木简。1930年,中国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在其东方发现了一万左右木简。顺便说及,中国解放以后,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些木简、竹简,其中有战国时代墓中的随葬品目录,有孙子兵法等。今天我主要谈居延、敦煌、楼兰三个地方的木简。中国的书在纸张出现以前是写在木头和竹子上的,但直到1900年为止,一个实物也没见到。1900年,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一百多木简,几年以后,斯坦因也在敦煌和楼兰发现木简。这件事震动了整个世界。日本十七、八年以前也开始发现木简,现在三十多个地方共出土三万枚。目前正在积极进行研究。

最大批的发现是居延汉简。这是由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班,队长是贝格曼,1930年在这一带发掘的。发现了一万多件。这批木简曾由北京大学的许多先生如马衡等进行研究。可是不知道什么

原因，最后只有劳干先生继续研究下来了。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上曾发表了一些文章。1937年发生了战争，在这以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的东西大部分送到了瑞典，用汉字写的留在了中国。原因是用汉字写的中国人研究比瑞典人研究更方便。1931年开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把这些木简送到了南京，由南京又送到美国，解放以后，本应还给中国，但美国却送给了台湾，这一万多件木简现在在台北。在美国时，是放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中的，当时曾经有几个人想到美国去研究，但是放木简的十三个箱子虽然是在国会图书馆，钥匙却由中国大使馆掌管，二十几年中，没有任何人见到这批东西。送到台湾以后，曾打开过，但很快又收了起来。只有一百来件做为样品陈列在玻璃柜里。我没去过，只是听说的。本来想在上海出版这批木简的图录，但正在印刷期间，发生了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炸。后来又打算在香港继续印刷，也由于战争再次被破坏了。以后劳干在四川南溪找到一个石印的印刷厂，印了释文与考释共六册，一百多部。1949年，中国科学院把石印本加以修订出版了铅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其后，至于1957年，劳干先生又用他保存的校样出版了图版（A—3）。可惜印得不清楚。又出版了《考释》；此本没有参看铅印本，因此还有不少错误。中国科学院把过去分散在北京大学的先生们手里的汉简集中起来，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附表第六项中是乙编。甲编和乙编仅仅包括了现在存在北京的那部分木简，远远不是居延汉简的全部。劳干先生不是考古学者，因此他没有把木简所写的地点和原来的编号一个个相对照。陈梦家先生曾对出土的地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甲编中很细致地记录了出土地点，可是还没有包括全部木简。在这以前我写过一篇《汉简职官表》。在1963年第一期《考古学报》

中所登载的陈先生的《汉简考述》这篇论文里，他指出此表有若干缺陷。其后永田英正君改作一表，就好多了，附表中A₍₁₎—(6)是居延汉简的释文和汉简，参考部分(7)是考古的报告。(8)是台湾的一百件样品和罗布淖尔の木简，此书像片很清楚，但释文不好。(9)是复印的劳干先生的著作。在此书印刷过程中才知道。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居延发现了两万件木简，在追记中谈到这一点。（即附表中所列居延汉简之二，原书中没有。）

敦煌简：1906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了七百简。斯坦因木简由法国人沙畹和王国维、张凤作了释文和考证。他们的释文有很多错误。附表B₍₄₎之附录中列有无名氏的《敦煌汉简校文》，这个无名氏一定是陈梦家，除陈梦家之外没有这样高水平的专家。附表B₍₆₎是英国人Michael Loewe所写的关于居延汉简中的若干类型的木简的论文。在这之前，他在京都参加了两年多的共同研究。斯坦因1914年又来敦煌，发现了250枚木简。那时沙畹已经死了，沙畹的学生马伯乐自己制做了图版。1944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组成了以夏含夷为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和赫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不是一回事），在敦煌又发现了43件木简，不知现在是否在北京。

罗布简：三十年代初期黄文弼为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罗布淖尔附近发现了71简。和居延汉简一起，现在在台湾。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有照片，复原和考释。

楼兰简：附表A、B、C都是汉简，D是楼兰简。从时间上比汉简晚了二三百，换言之，就是出现了纸以后的木简。在楼兰，木简是和纸同时发现的，居延汉简的时代还没有纸，所有的字都写在木简上。楼兰木简最初是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的，现在在斯德